

嵌入与认同：社会关系视角下 滇北基督教的中国化实践

廖鹏飞 赵敏

玉溪师范学院

摘要 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重大使命，是宗教领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既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或观念层面的神学教义讨论我国宗教中国化，较少从信仰者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探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本文基于对滇北地区基督教的实地调研，以社会关系为理论视角，分析基督教信众与教外群体的双向调适过程，探究基督教中国化通过亲缘关系中的行为调适与身份融入、地缘关系中的互助融入与社区团结以及治理关系中的引导适应与价值认同，逐步嵌入地方社会秩序、实现价值认同的微观实践机制。该机制在家庭、村寨与公域情境中发挥社会联结作用，将基督教信仰群体分别纳入相应共同体的社会网络与伦理秩序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基督教中国化微观实践样本。

关键词 滇北；社会关系；基督教中国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407> 文章编号 2664-1127.2026.0804.66-76

一、引言

宗教是民族地区重要的社会现象，对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具有特殊重要性。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重大使命，是民族地区宗教领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

既有研究侧重从宏观视角出发探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论取向与政策制度。黄奎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论视角。^①张二平从政策指导、工作体制、法制保障、团体规划、智库研究、话语建设等方面讨论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施成效。^②何虎生、郭澳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论导向与实践路径，认为我国宗教中国化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理论创新为行动纲维、以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为旨归、以政治认同为核心引领、以文化浸润为深厚涵养、以社会适应为

作者简介：廖鹏飞，玉溪师范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宗教社会学。

通讯作者：赵敏，玉溪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国际中文教育。

基金项目：2025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社会智库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滇北基督教信仰秩序研究”（项目编号：ZK2025YB37）阶段性成果。

© The Author(s) 2026. CC BY-NC-ND 4.0. **Article History:** Published: 15 August 2026 (online), (print).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ISSN 2664-1127 (Print). Published by Creative Publishing Co., Limited 开元出版有限公司. Email: cpcl@cpcl.hk.

①黄奎：《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世界宗教研究》2026年第1期。

②张二平：《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新实践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26年第1期。

革新向度、以治理现代化为发展导向、以压实主体责任为贯彻机制。^①毛胜从政治、社会与文化层面阐述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维度,认为“必须教育引导宗教界坚持爱国与爱教相统一,必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深入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②此类研究重视宗教中国化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但忽视了宗教群体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亦未能充分揭示宗教中国化在地方社会中的内生动力。

另一方面侧重探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分析宗教教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融合与重构。张志刚认为基督教中国化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③并从义理上深入阐述了宗教中国化需要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④游斌基于分形理论,提出基督教中国化的跨宗教神学体系建构思路。^⑤利百加主张“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规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⑥杨华明提出“道成肉身”应作为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建构路径,认为基督教的“道”需在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等具体“肉身”中得以表达和实现,从而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神学合法性。^⑦此类讨论主要聚焦观念世界,与具体而微的社会实践存在差距,即宗教神学或教义的中国化与生活实践的中国化不一定完全对应,因为信教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践行中国化,并非仅由神学和教义决定。在我国宗教中国化微观实践方面,张桥贵、杨雅楠通过深入观察彝族基督徒如何通过具体的仪式、符号和意义实践,探讨信仰如何通过日常生活的微观实践实现本土化,揭示宗教如何通过适应日常生活的节奏、借用日常生活符号、参与日常生活仪式,成为生活的“意义网络”,最终实现“宗教即生活”的在地化融合。^⑧这一研究切入生活实际,从微观视角考察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论断指出社会中的个体处于多样化的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是理解现实中人的社会行动与意义的重要方法与路径。对基督教信仰者而言,除了因信徒身份而构成的宗教关系外,还因是农民、教师、医生、商人等不同身份而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在信仰生活中,信仰者通过群体性的宗教仪式与教会活动进行互动,建构基督教内部的人际关系。在非信仰生活中,信仰者通过世俗性生产生活,以各种身份和角色参与社会互动,从而嵌入亲属、邻居、朋友等多样化社会关系中。“作为宗教载体的信仰者首先是社会意义上的人,然后才是宗教意义上的人。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必是他处于其中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⑨信仰者基于多种身份所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这决定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不能仅通过宗教内部关系的自我改善来完成,还需要通过信仰者在其他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调适来实现,以与教外群体相互适应,形成一种“双向调适”的微观互动机制。这一机制包含两个向度:一方面是社会的正向引导,国家与社会通过制度安排、政策推进与价值倡导,对信仰者进行方向性引导,使其在政治认同、社会参与与文化融合方面逐步中国化;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的主动适应,在信仰逻辑内主动进行策略性调整,通过仪式形式、组织方式、社交模式等方面的调适与转化,实现与地方社会文化的融合。“双向调适”处于方向性引导与能动性适应的辩证统一之中,二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交汇互动,构成基督教中国化的微观动力机制。因此,考察信仰者多样化社会关系及其行动逻辑,是探究我国宗教中国化实践的重要路径。

①何虎生、郭澳:《论新时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基本经验》,《世界宗教研究》2025年第8期。

②毛胜:《深刻认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三个维度:相统一、相适应、相融合》,《世界宗教研究》2026年第2期,第1页。

③张志刚:《“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三重视野》,《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2期,第6页。

④张志刚:《“宗教中国化”义理沉思》,《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3期,第21页。

⑤游斌:《分形理论、宗教对话与基督教中国化》,《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10期。

⑥利百加:《“八福神学”:探索构建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12期,第94页。

⑦杨华明:《试析基督教中国化理念中的双重辩证法》,《世界宗教研究》2025年第10期。

⑧张桥贵、杨雅楠:《云南武定彝族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信仰实践:宗教中国化的微观建构与意义生成》,《世界宗教研究》2025年第12期,第42页。

⑨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53页。

本文以社会关系为理论视角,以多民族地区云南武定田心乡为田野点,探究基督教信众与教外群体在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及基层治理关系中的双向调适机制,呈现基督教中国化通过亲缘关系中的行为调适与身份融入、地缘关系中的互助融入与社区团结、治理关系中的引导适应与价值认同,逐步嵌入地方社会秩序并实现价值认同的过程,进而形成基督教中国化的社会关系实践路径,并考察这一路径在家庭、村寨与公域情境中发挥的社会联结作用对系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意义。

云南中北部武定县境内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信教群众2.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信教群众1.56万人,占信教总人数的67.45%。基督教1.52万余人,占信教总人数的66.1%,占全县总人口的5.42%。田心乡地处金沙江河谷地带,山高谷深,地貌破碎,总人口1.8万余人,居住着汉、傣、傈僳、彝、苗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过50%。20世纪初,基督教传入田心地区,距今已有百余年的信教历史^①。目前,信教人数近1100人,信教民族包括彝(支系黑彝与甘彝)、苗、傈僳、傣、汉等。经过长期传播与本土化过程,基督教与外界环境形成双向调适实践机制,以行为调适建构亲缘关系、互助协作建构地缘关系、引导适应建构基层治理关系的方式,逐步融入地方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中,成为地方社会文化与信仰秩序的重要构成部分,为我国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微观实践样本。

二、亲缘关系中行为调适与身份融入

亲缘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中最基础最持久的联结方式。对于基督教信众而言,亲缘关系既是日常生活的基础场域,也是基督教中国化实践的首要路径。田心地区各民族长期实行族内通婚,村寨内各家户之间呈现复杂交织的亲属关系网络,共同的祖先记忆与民族认同构成了亲属群体的凝聚纽带。信仰者面对亲缘关系中所承载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通过祭祖仪式中的行为调整、立碑修谱中的身份并立、婚礼仪式中的双重认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亲情维系,实现行为调适与身份融入,体现了基督教对地方社会文化秩序的主动适应,以及在适应中对共同体身份的积极建构。

(一) 祭祖仪式中的行为调整

祖先崇拜是宗族身份建构与民族认同凝聚的重要方式,对祖先的崇敬与祭拜,构成了个体确认自身宗族归属、获取族群成员资格的基本路径。祖先崇拜在田心傣族社会中表现为两种仪式,其一为年末除夕各家户祭祀本宗族历代祖先,以家庭为单位强化宗族凝聚力与认同感;其二为新年初一全村共同参与的“除行”活动,全村集体巡行各宗族祖先初入所在地并共同祭拜,强化各宗族彼此认同与相互接纳。

祭拜祖先虽与基督教唯敬上帝的信仰原则相抵触,但在深受宗族与民族双重观念影响的傣族信教者看来,祭祖并不是单纯的崇拜行为,而是身份建构与成员资格获取的重要手段。在傣族社会中,参与祭祖意味着作为宗族与民族成员的身份确认。完全拒绝参与祭祖行为,则可能在宗族与民族的双重族缘结构上造成身份的疏离与关系的断裂。因此,傣族信教者为了既能保持信仰立场又不致破坏亲缘纽带,在实践中发展出一种行为调适策略。一方面尊重传统,对家人和族人的祭祖仪式不但不予反对,且在祭祀过程中帮助宰杀牲畜、准备祭祀用品,以行动表达对祖先与族人的尊敬,以此维系宗族与民族内部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坚守信仰禁忌,在祭祖仪式进行到跪拜、磕头、烧香等祭拜环节时,基督徒则选择站在一旁而不参与。这种既不完全回避也不全然投入的“有限参与”,使其在尊重传统与坚守信仰之间找到了平衡。

我们这个家庭是比较和谐的,我媳妇(基督徒)对我爹我妈相当尊重。信佛的人都要信奉老祖先。每逢杀鸡宰鹅的时候,她都会给老人帮忙,准备这些祭品。在祭拜中,她就站在一边看着,也不会磕头。需要什么,她也会帮着去做。到礼拜天的时候,她(媳妇)自己去信,回来后她自己该做的事情去做就行了,我不会干涉的。在星期天(礼拜日),她(媳妇)也不会反对你宰鸡宰鸭,大不了就说今天是礼拜日,就

^①张桥贵、廖鹏飞:《云南省武定县田心乡傣族基督教信仰与族际互动》,《世界宗教研究》2024年第1期,第102页。

不吃了，我们也尊重她。^①

基督教信仰者在祭祖活动中采取“有限参与”的方式，得到亲人的理解与包容。双方各守其道、各尊其俗，互不干涉，让信教者得以在参与中划定信仰的边界，在坚守中维系亲缘的纽带，形成具有包容性的共存模式。信仰者无需放弃信仰即可保持亲缘关系的完整，亲缘群体无需放弃传统即可容纳信仰者的差异身份。

（二）立碑修谱中的身份并存

立碑修谱是家族成员共同参与的确认身份与强化认同的亲缘性群体行为，它将分散的家户整合为具有共同祖先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共同体。2022年田心地区傣族村文姓家族准备为祖辈立碑并梳理族谱，而承担这一任务的核心人物之一恰是一位基督徒。该信徒为理清家族谱系，遍访村中老人，逐户搜集关于祖辈名讳、生平、支系源流等信息，为立碑撰谱四处奔忙，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在这位基督徒眼中，立碑修谱所蕴含的祖先崇拜观念虽与基督教信仰存在张力，但他并未因信仰立场而回避或拒绝这一蕴含祖先崇拜意涵的家族事务，反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其中，成为家族立碑修谱实践的重要推动者。该行为不仅反映了信仰者对家族身份的深层认同，也体现了面对传统所作出的积极调适。信教者没有以宗教信仰否定家族传统，而是以家族认同容纳信仰身份。其参与立碑修谱的行为表明，基督教信仰与家族传统并非对立关系。信仰者在上帝面前是信徒，在家族面前是家族成员，这两种身份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以家族成员的身份参与立碑修谱，同时以基督徒的身份保留对祖先的追思方式，两种身份在同一实践中兼容并立，使信仰者的宗教身份与家族认同实现共存。信仰者在亲缘关系中既不失信仰立场，也不弃家族责任，在双重身份的协调中实现对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融入与适应。

（三）婚礼仪式中的双重认同

婚礼是亲缘关系建构的核心仪式，也是信仰者身份与认同最为直观的展演场域。田心地区傣族基督徒的婚礼仪式生动展现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者在亲缘关系中如何转换多重身份而实现彼此认同。

2023年3月1日（农历二月初十，黄道吉日），一场基于不同民族文化和信仰观念的婚礼在武定县城举行。新郎为傣族信仰基督教；新娘为彝族信仰原始宗教。婚礼仪式首先在武定县基督教清心堂举行。新郎穿西装、打领带，新娘穿白色婚纱，胸前挂着一面寓含驱邪纳福的圆镜。穿着傣族传统服饰的傣族信徒与非信徒在教堂门口排成两列，跳傣舞迎接新人。婚礼依次经历献诗、讲道、证婚、宣誓、祷告等基督教仪式环节。婚礼在教堂中的仪式结束后，新人及亲友驱车前往新郎住宅，亲人炸鞭炮迎接新人。新人进入婚房，换上傣族传统服装，基督徒亲友在婚房中一起为新人祷告。随后，新人身着傣装与亲友驱车前往婚宴酒店迎接宾客。而后在酒店婚礼仪式上新郎换回西装、打领带，新娘换回白色婚纱，按照现代西式婚礼流程完成仪式环节。

整场婚礼，傣族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织并行，构成了一幅多元身份与多重认同在亲缘关系场域中共存的图景。婚礼实践展现了空间转换与身份展演之间的深层关联，从教堂到婚房再到婚宴酒店，空间的转换意味着文化背景与社会关系的转换，也意味着新人与参与者在不同空间中呈现不同身份与认同。婚礼实践表明信仰者的身份依据情境变化而具有多元性。信仰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中调动不同身份资源，以适应不同互动对象的期待与规范。这种身份的情境性切换表明宗教身份与其他身份能够相互兼容。当宗教身份与其他身份和谐共存时，信仰者便能融入亲缘共同体之中，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社会关系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建立在身份同一性之上的强制统一，而是基于身份兼容性的包容与共生。多元身份在亲缘关系中的和谐共存，使共同体在差异中凝聚、在包容中团结，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微观社会关系层面的生动体现与坚实支撑。

（四）日常生活中的亲情维系

^①被访谈人：WMR，男，老把村人；访谈地点：鲁期村委会；访谈时间：2022年7月22日。

仪式性互动具有显著的文化象征意义,而亲缘关系的维系则更多依赖于日常生活中的细密互动。这些日常互动虽无显著的宗教意涵,却能潜在地塑造信仰者在亲缘共同体中的位置与形象,使信仰者以家庭成员的角色融入亲缘关系的伦理秩序之中。

田心某白姓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以多重角色履行家庭责任。该基督徒家庭和睦,与家人说话轻言细语,从不以粗暴的言语对待亲人。他教导嫁至外地的女儿要与公公婆婆融洽相处,对老人要尊重有加。在日常饮食上,他细心体察老人饮食偏好与身体需要,使年迈的母亲在日常餐食中感受到晚辈的关爱与体贴。这些日常行为以最朴素的方式践行关爱家人、尊敬老人的伦理要求。某文姓基督徒同样展现了信仰者在日常生活中对亲缘关系的积极维系。该基督徒精心照料八十多岁的母亲,日常起居、饮食用药无不亲力亲为,以孝道之心尽人子之责。他为两个已达婚龄的儿子操心前程和婚姻大事,以慈爱之心尽父亲之责。他与出嫁在本村的妹妹互动频繁,经常互赠糕点、肉食、蔬菜、水果等。在传统节日,两家互相邀请,一起聚餐过节。该基督徒在亲缘关系中的多种角色上,很好地扮演了传统所规定的职责与义务,以日常言行举止诠释了“孝”“慈”“悌”的伦理内涵。

这些日常互动表明信仰者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履行孝敬老人、关爱子女、维系兄弟姐妹关系的伦理责任,正是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具体实践。基督教“爱人如己”的观念与中华传统伦理在此形成了价值契合。信仰者既以基督教“爱人如己”为精神动力,又以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为行为规范,两种价值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支撑、彼此印证,使信仰者在亲缘关系中既不失信仰的精神根基,也不弃传统的伦理责任,以双重价值的实践融入亲缘共同体的日常生活秩序之中。

综上所述,亲缘关系中的行为调适与身份融入构成了基督教中国化微观实践的首要路径。信仰者在亲缘关系的互动实践中,通过仪式行为的适当调整、家族事务的积极参与、婚礼仪式的身份展演以及日常亲情的伦理践行等方式,将基督教信仰嵌入亲缘共同体的文化秩序之中,有效消解了信仰差异可能引起的家庭分裂与族群隔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来自亲缘层面的社会基础。

三、地缘关系中互助融入与社区团结

地缘关系是基于空间毗邻而形成的邻里联结,是村寨共同体的基本构成方式。邻里之间的往来互助、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集体活动的协商组织,构成地缘交往的主要内容,是村寨共同体凝聚与运作的社会基础。滇北田心地区各民族以村聚居,信教群体与非信教群体毗邻而居,虽存在信仰边界,但基于地缘互动而形成的世俗性关系发挥着强大的联结能力,以互助合作实现社区团结。

(一) 邻里互助中的价值叠加

邻里之间的互助合作不仅是一种实用性的生存策略,更是一种深植于传统的文化规范。日常互动将分散的家户联结为具有共同利益与情感认同的村寨共同体。田心地区傣族村寨邻里互动传统具有代表性,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关于如何相处、如何互助、如何维系村寨团结的行为规范与文化传统,村中残碑记载:□□人不可慢他;读书知礼不可轻他,□□人不人可忘他;无情亲戚不可近他;□□□□不可学他;过去冤仇不可□他;无□之言不可说他;孤寡良善不可□□;带人书信不可折他;寄人书财不可□□;□□□□不可唆他。这些村规民约为村民邻里互动提供了明确的行为准则,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与规范性,对村寨团结和睦发挥积极作用。

我现在已经30多岁,还是在十几岁的时候看见村里人打过一次架。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看见或听见村里有人闹矛盾起冲突的事件发生。^①

村寨睦邻友好的传统对身处其中的基督徒具有形塑作用。而“不可慢他”“不可轻他”“不可忘他”的相处之道,与基督教“爱人如己”的信仰要求在价值取向上高度契合。二者均强调尊重他人、善待邻里、

^①被访谈人: NYY, 男, 老把村人; 访谈地点: 鲁期村委会; 访谈时间: 2022年7月30日。

扶助弱者、维护和睦。这种价值契合使基督徒能很好地嵌入邻里关系之中。某白姓基督徒在插秧苗或收割稻谷时节,即使自家农事再忙,只要邻居有求必会帮忙,有时还会主动帮工,不需邻居开口;某李姓基督徒家里养了上百只牛羊,有人建议安装监控以防盗窃,但他没有采纳,理由是:

《圣经》告诉我们要爱仇敌,仇敌都爱,就没有什么人来害我们。^①

这既是基督教“爱人”观念的践行,也是村寨邻里互信传统的体现;某文姓基督徒常被邻居请去为红白喜事记录送礼账目,账目涉及各家户礼金往来,记账人需要信得过的人来完成。该基督徒受邀承担这一任务,正是基于村民对其人品的认可与信任;某朱姓基督徒尽管长期在外工作,但凡遇村中红白喜事,都会从外地赶回来帮忙。通过红白喜事的具身参与,持续保持与村寨邻里的社会联结。

田心地区基督徒的邻里互动行为,既是对基督教信仰观念的践行,也是对睦邻友好传统的延续。两种价值体系在基督徒建构邻里关系中互相强化,信仰观念为互助行为提供了宗教动机,地方传统为互助行为提供了文化规范。信仰与传统的叠加效应使基督徒在邻里互动中呈现出高于一般水平的互助行为,这种行为既得到了邻居的认可,也使基督徒顺利嵌入村寨的邻里网络,成为村寨共同体中积极而可靠的成员。

(二) 集体活动中的信任累积

集体活动不仅是村寨团结的仪式性展演,更是村寨内部信任关系与组织能力的实际检验。基督教信仰群体积极参与村寨集体活动,有助于信仰者累积信任,融入村寨共同体。阿么勒村是田心地区的彝族村寨,有每年开展三次集体共食的传统活动。活动地点在村寨中心,届时家家户户自带玉米粉、豆子等食材,集中后一同烹饪,后分而食之,吃不完可带些回家。共食传统将各家户贡献的食材变为村民共享的食物,象征性地再现了村寨共同体从个体贡献到集体共享的运作逻辑,在食物汇聚与分配中实现社会联结与情感交融。而共食活动的组织者一般由基督徒担任。村民们认为信教的人讲奉献,值得信任。基督徒积极参与村寨集体活动,一方面是其信仰观念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出于通过服务村人建立良好关系而融入村寨的策略性考量。信仰动机与融入策略使基督徒在集体活动的组织中既保持了宗教身份的自觉性,也展现了社会身份的灵活性。

基督徒组织参与村寨集体活动,在公共事务中获得了超越信仰边界的信任。村民将集体活动交由基督徒组织,并非对基督教信仰的认同,而是对基督徒个人德行的信任。“奉献”既是基督徒道德的外在表现,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在要求。这一品质上的价值共鸣,使非信徒村民能够以传统价值框架来理解与认可基督徒的“奉献”行为,进而产生信任。信任的累积使基督徒从信仰的邻居转变为值得信任的组织者。这一身份转变的意义在于基督徒在村寨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不再仅由信仰身份所定义,而是由社会信任所赋予。信仰边界在公共事务的组织与参与中实现跨越,基督徒以值得信任的组织者身份融入了村寨共同体的公共生活。

(三) 教堂建盖中的社区支持

教堂建盖是教会集体宗教行为,是信教群众以信仰热忱与物质奉献共同营建信仰空间的社会实践。从宗教意义上说,教堂建盖是信徒对上帝的侍奉,是基督教群体凝聚力的表达。而在具体行动中,教堂建盖涉及教会内外各个方面,其活动范围已跨越信仰边界。因此,田心地区建盖教堂不仅是信教群众的宗教事务,还是牵动整个村寨的公共事件。教堂建盖的物质需求、人力动员与仪式庆典将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纳入同一个行动场域,信仰边界在集体行动中呈现出可被穿透的柔性边界。2013年,鲁期教会教堂建成,并举行献堂活动。参与活动的不只有信教群体,还有村寨中的非信教群体。

整个田心地区的教会都来了。而且村子里一些不信教的人也来参加,并捐赠。他们说虽然不信教,但还是要帮助你们。^②

2018年,老把教会教堂建成,并举行献堂活动。前来参加活动的人数众多。老把全村人无论信教与否

①被访谈人:LJG,男,昔卡支人;访谈地点:鲁期教会聚会点;访谈时间:2022年8月5日。

②被访谈人:LJG,男,昔卡支人;访谈地点:鲁期教会聚会点;访谈时间:2022年8月5日。

都投入到交通疏解、饭食准备、宾客接待等各项活动中。

建盖基督教教堂的时候，我们整个村的多数家庭都是有奉献给他们的。教堂建盖好以后，老把村每家每户都出钱捐助他们。教堂在浇灌房顶的时候，村民们也去帮忙。他们举行献堂庆典仪式，整个村的人都去参加，并且都投钱到奉献箱，一百也好两百也好，就像相互支持一样。^①

从教堂建盖时的财物奉献与人力帮工，到浇灌房顶时的出力帮忙，再到献堂庆典的全村参与与集体捐献，非信教群众参与贯穿了教堂建设的每个环节。村民将这种参与理解为“相互支持”，帮助建教堂是村寨内部互助的日常实践。献堂活动中的包容性互动同样值得关注。

那些非信徒，就另安排一桌，允许他们抽烟喝酒，我们不反对。^②

这种彼此包容的态度使信仰差异在集体活动中成为可以协商处理的日常事项。

信教群体与非信教群体相互支持与包容的良性互动，展现了信仰边界并未阻断村寨共同体的集体动员。当信仰群体建盖教堂被纳入村寨公共事务范畴时，非信教村民基于邻里互助与村寨团结的世俗逻辑同样参与其中，信仰边界在集体行动中被跨越，村寨共同体的团结功能得以彰显。在地缘关系中，信仰边界并非封闭的壁垒，而是可被集体行动所穿透的柔性边界。当基督教活动与村寨公共利益交汇时，信仰差异退居次要位置，村寨团结的逻辑优先发挥作用。这种基于地缘身份而非信仰身份的参与逻辑，使信仰群体与非信仰群体在集体行动中实现了超越信仰边界的合作与团结，也使基督教的集体宗教行为成为村寨共同体团结功能的展演场域。

综上所述，地缘关系中的互助融入与社区团结构成了基督教中国化微观实践的第二种路径。基督教信仰群体通过邻里互助、集体活动组织参与、教堂建盖的社区支持，逐步嵌入村寨共同体的社会网络中，使信仰边界成为村寨共同体内部可穿透性边界。地缘关系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消除信仰群体与村寨共同体之间的隔阂，使信仰者与非信仰者在共同的地缘空间中相互支持、相互包容，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来自地缘层面的社会基础。

四、治理关系中的引导适应与价值认同

基层治理关系是基于行政管理体系而形成的干群联结。从乡镇到村委会再到村组的基层治理架构，构成了干群互动的制度化渠道。在这一渠道中，基层宗教工作体系以组织化的方式实现对基督教的正向引导，基督教会以规范性的教务管理方式适应治理工作，二者在互动实践中形成引导与适应的双向调适模式。具体而言，田心乡构建了“乡（镇）宗教工作班子统筹（设民宗专干）—村委会联络员协作—村组干部配合”的宗教工作体系，在宗教治理实践中实现对基督教的正向引导。相应地，基督教会形成了“教务组—教会片区—各堂点”教务管理体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主动配合基层治理。基层治理关系中的双向调适不仅保障了宗教活动的合法合规，更通过在场性的互动实践引导信众实现价值认同。

（一）建构宗教与教会对应性工作体系

基层治理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制度架构的合理性。田心乡宗教工作体系与基督教教务管理体系之间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对应关系，为基层治理与宗教适应提供了互动基础。按照“乡政府—村委会—自然村”的基层治理体系，田心乡形成的“乡（镇）宗教工作班子统筹（设民宗专干）—村委会联络员协作—村组干部配合”宗教工作体系，实现了从乡镇到村组的宗教工作责任全覆盖。田心地区基督教组织管理运行体系为教务组统辖全乡各教会事务，由各教会主要负责人组成并行行使管理职能；教会片区统筹所辖教会事务，由片区负责人承担组织联络职责；各教会以堂点为基本单元，由教会负责人（长老）管理本教会日常事务。由此，基层宗教工作与教会组织管理之间形成了三层对应关系：乡级工作班子与教务组对应，具体由民宗

①被访谈人：WMR，男，老把村人；访谈地点：鲁期村委会；访谈时间：2022年7月22日。

②被访谈人：WSC，男，老把村人；访谈地点：WSC家中；访谈时间：2022年7月20日。

专干与教务组主要负责人对接协调；村级工作班子与教会片区对应，具体事务由宗教联络员与片区负责人对接协调；村组干部与教会对应，具体由村长与教会负责人对接协调。基层宗教工作与教会组织管理在体系架构上的结构性对接，为互动实践的有序展开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对应性制度框架下，教务组在基层宗教治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性作用。教务组由各教会主要负责人组成，是教会精英群体的集合。基层政府传达宗教政策与法律法规信息、组织培训或知识讲座，由民宗专干与教务组核心负责人对接具体事务，再由教务组转达至各教会并组织教职人员参加。由于教务组成员在信教群众中具有较高威望，由其转达基层政府宗教工作相关事务和信息，信众更易理解和接受。同样，基督教要举办集体性宗教活动，会由教务组出面邀请基层政府代表参加。教务组在基层政府与各教会之间扮演了信息传递、组织联络与信任中介的角色，使政教互动不是直接的、扁平的行政指令传导，而是经过中介组织的缓冲与转化，以更柔和、更有效的方式实现双向沟通。

在日常宗教工作中，民宗专干通过教务组负责人对教会人员变更进行登记，对建堂建盖及节庆活动申请进行审批。在深入了解教会情况中，民宗专干一般由教务组负责人带领深入各教会。在与教职人员长期互动中，彼此熟知，相互信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开展宗教工作。

村级宗教治理工作组由村委会及村组干部组成，实行“四查看一报告”，即查看属地各教会有无未批先建的宗教活动场所、有无私设聚会点、有无外来传教人员、有无未成年人进入宗教活动场所，须每月向乡镇报告工作情况和宗教活动情况。村网格员实行“月查看一报告”，即每月查看本村有无未批先建的宗教活动场所、有无私设聚会点和教资教产公开，查看教职人员开展宗教活动情况、传道情况，及时向村党组织上报异常情况。村组干部由此对教会情况及变化得以及时掌握。

宗教工作中，对信众真实情况的了解、与信教群体信任关系的建立、对信仰观念的正确引导，需要基层工作人员长期深入信仰群体、面对面交流互动。制度架构为治理关系提供了形式保障，互动实践为治理关系提供了实质内容。制度架构使治理关系具备了组织化运作渠道，互动实践使治理关系获得了情感化交流效应。制度架构完备且互动实践深入使治理关系中的引导适应从构想变为实效。

（二）助力信教群众适应现代生活

经济基础是社会融入的重要条件。在现代化进程中，只有信教群众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其社会融入才具备坚实的物质保障。而贫困与基督教之间存在深刻的历史关联，为基督教传播提供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处于“物质生活匮乏、社会需要极度短缺的贫困社会。正是这种社会的边缘状态和短缺，作为宗教的前提，先在地为基督教的传播，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文化基础。”^①基督教正是在物资匮乏与社会短缺的背景下获得了传播的社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各民族逐渐摆脱贫困。尤其是近年来，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田心乡在信教地区大力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实施项目总投资为2057.76万元，包括硬化村组道路、村间道路、安装太阳能路灯、架设饮水管道、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新建村民活动场所、新建水池沟渠、新建机耕路、新建卫生室等。在危房改建项目推进过程中，一些信众心存疑虑。

他（信徒）问我能不能盖，我说你要盖就赶紧盖。他享受了（国家建房补贴）12万（包括6万的补贴，6万无息贷款），自己贴不着多少。房子是他兄弟帮他盖的，他就是出着材料钱，还有小工钱，那时就是七八十块钱一个小工每天，自己就出着几万块钱。^②

基层干部的解释与动员消除了信众的疑虑，政策的实惠让信众切实感受到国家的关怀，住房的改善使信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实质性的提升。物质改善不仅解决了信众的住房安全问题，也为信教群众适应并融入现代生活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信众在基层治理关系的互动实践中建立了对基层干部的信

^①钱宁：《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35页。

^②被访谈人：WMR，男，老把村人；访谈地点：鲁期村委会；访谈时间：2022年7月22日。

任基础。

在面对极少数信众的消极表现时,基层工作人员持续深入信教地区,多方面帮助信教群众,使其在思想和行为上有所变化。杨姓基督教家庭最初对国家政策心存抵触,但在基层干部持续深入的帮扶与互动中,逐步实现了从消极回避到积极认知的转变。

信教的是兄弟,不信教的干部是我们的好朋友。^①

杨姓案例表明物质改善是基础,日常互动是中介,情感联结是结果。物质改善、日常互动与情感联结的三重叠加,使信众在治理关系的互动实践中不仅适应了现代生活方式,更对基层治理体系与干部群体形成了好感与信任,将信仰身份与公民身份予以协调,建构了信众与基层治理体系之间的友好关系。这种跨越信仰边界的关系正是治理关系中双向调适的生动体现。

(三) 引导信教群众实现价值认同

价值认同是社会成员通过互动实践对某类价值观形成的认可与共识,这些基于传统的、道德的、审美的以及信仰的观念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为社会成员自觉遵守,作为行动方向与准则对社会成员的互动实践具有规范作用。田心地区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各民族文化兼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传统价值认同。随着新社会制度的建立,与之对应的理想和信念作为主流价值观为田心各民族所认同。传统价值作为认同基础,主流价值作为认同核心,对田心各民族信众发挥或潜或显的价值引导作用,共同构成治理关系中引导信众实现价值认同的重要内涵。

(1) 传统价值观认同

传统文化价值观作为构成地方社会文化秩序的基础性资源,对信教群众具有规约作用,通过外在文化表征和内在道德品性实现观念引导与行为规范。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建筑风格是价值观的外在表现。田心各民族建筑文化对基督教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以傣族教堂为例,教堂整体呈干栏式建筑风格,主色调为金黄色,堂内墙体上挂有六幅书法作品,用毛笔竖排书写“荣神益人”“以马内利”“神爱世人”“复兴主工”等内容,左下角落款日期用天干地支传统纪年法,并盖有印章。干栏式建筑是傣族传统居住形式的文化表征,其蕴含的生活方式与美学趣味已内化为傣族的心智结构与审美习惯,对傣族教会基督教信仰空间的结构功能与文化内涵具有形塑作用,使其在建筑形态上呈现出傣族风格。书法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符号,教堂内悬挂书法作品,反映出信仰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涵的理解,意味着信仰空间对中华传统审美形式的接纳。信仰空间的建筑风格与装饰方式虽然由信众自主决定,但信众的审美判断与风格选择已经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信仰空间的文化取向,使基督教逐步认同并融入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

传统文化除了通过建筑等外在文化表征对基督教文化发挥引导作用外,还通过教职人员内在的道德品质实现对信众的引导。在社会互动中,教职人员展现出的优秀道德品质是宗教德行与传统美德的双重体现。善良、正直、公正、无私、真诚、诚信、友爱、奉献等道德品质既符合基督教的信仰要求,也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规范。宗教德行与传统美德的叠加使教职人员在互动实践中获得了双重认可。宗教层面的认可赋予其教会内部的权威,传统层面的认可赋予其世俗社会的声望。这种双重认可使教职人员成为传统价值观引导信众的载体。信众对教职人员的尊敬与追随,不仅是对其宗教德行的认可,也是对其传统美德的认同。传统价值观对基督教信众的引导不是外在的强制规约,而是内在的人格感召,传统美德以教职人员的道德品性为载体,通过人格魅力的感染与示范效应的吸引,潜在地引导信众认同传统价值观,形成一种人格中介机制,以道德品性来间接感召信众,使信众在对教职人员的尊敬与追随中认同传统美德,实现传统价值观的隐性传承。

(2) 主流价值观认同

社会主流价值观是由国家倡导推行的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精神

^①资料来源:田心乡政府《田心乡鸡街子重点地区群众转化的理由和依据》(2021年12月16日)。

力量,是一个社会由人民大众所普遍接受、认同,在各种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行为互动过程中汇聚而成的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念体系”^①,对社会整合、民族团结发挥重要作用。与传统价值观的潜在引导不同,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具有显在的制度化特点。

田心乡通过“五进”与“和谐寺观教堂”创建行动,对信教群众进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所谓“五进”,即国旗国歌、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团结进步建设进宗教活动场所。具体做法就是在宗教场所内升五星红旗、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组织信众学习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粘贴“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报等,涵养信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是在基层政府引导下,各教会学习和贯彻相关法律法规,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努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谐寺观教堂”的评选认定,成为“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爱国宗教力量的建设,防止民族宗教恶性事件,巩固宗教和谐、民族团结的重要资本。”^②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下,信众的思想观念发生显著变化。

原先有一个书记来调研,问我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我说共产党好得无比!一些党员犯了错误,没有办好党的事情,并不代表共产党这个组织不好,要把贪官和共产党组织区分开。现在我家孙子在读大三,是班长,学生会主席,正在写入党申请书,快要成为正式党员了。^③

基层宗教工作人员以“五进”活动、“和谐寺观教堂”创建为切入口,在推进过程中与信众进行广泛交往与深入互动,将主流价值观引入宗教活动场所,使信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知从抽象的政策条文转向具体的实践体验,进而从外在的制度要求转向内在的价值认同。

综上所述,基层治理关系中的引导适应与价值认同构成了基督教中国化微观实践的第三种路径。与亲缘关系中的行为调整使信仰者成为家庭成员的有机构成、地缘关系中的互助融入使信仰者成为村寨成员的有机构成一样,在治理关系中的引导适应与价值认同使信仰者成为治理关系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促成了信众对传统价值与主流价值的双重认同。传统价值的潜在引导使基督教信众在审美判断与道德遵循上逐步融入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主流价值的显在引导使基督教信众在政治认同与社会参与上逐步融入主流价值体系。双重引导使信众的价值认同不再局限于宗教信仰的内部维度,而是延伸至传统文化与主流社会的公共维度。价值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基,信教群体在互动实践中对中华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五、结论

云南武定田心地区信教群体在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治理关系中的嵌入与认同构成了基督教中国化社会关系路径。亲缘关系中的行为调整与身份融入,避免了信仰差异在家庭层面可能引起的分化,信教者并未因信仰而脱离亲缘共同体,亲缘共同体也未因信仰差异而排斥信仰者,二者在互动实践中形成了包容理解式的共存模式;地缘关系中的互助融入与社区团结,跨越了信仰边界在村寨层面可能形成的障碍,各族信教群体在族际互动传统与基督教信仰观念共同作用下,以博爱、友善和互助的观念和行动与邻里建立良性互动,从而积极融入村寨社会文化秩序中,为民族团结和社会整合发挥积极作用;基层治理关系中的引导适应与价值认同,消释了信教群体与治理体系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促成了信众对主流价值与制度秩序的认同。信教群体在主流价值观引导下,通过双向调适机制实现基督教信仰群体的价值认同。

①王秀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演进轨迹、形成机理与现实启示》,《河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第57页。

②萧霖虹:《武定县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宗教和谐的对策建议》,杨正权、黄云雁主编:《云南智库专家走基层:武定县跨越发展对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8页。

③被访谈人:LJG,男,昔卡支人;访谈地点:鲁期教会聚会点;访谈时间:2022年8月5日。

信教群体与非信教群体基于双向调适机制在亲缘、地缘、治理三维关系中展开的互动实践,让信教群体得以嵌入地方社会文化秩序并实现双重价值认同,进而在不同维度让信教群体结构性融入共同体之中。微观实践表明,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不仅要在制度政策与神学教义层面持续发力,还要深入信仰者日常社会关系的微观层面进行正向引导与经验总结。制度政策为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了方向指引,神学教义为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了思想资源,而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实质性完成最终发生在各类社会关系的日常互动之中。因此,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推进不仅需要改革完善教义教规与制度架构,更需要探究宗教中国化的微观实践经验,为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丰富的实践样本。此外,多民族多宗教地区的信仰差异可能构成共同体建设的潜在障碍,而基于各种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能够将信仰差异转化为共同体的包容性资源。云南武定田心地区基督教信仰实践表明,信仰者在亲缘、地缘、治理关系中与非信仰者进行良性互动时,信仰边界并未阻断对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反而通过互动实践的行为调整与关系嵌入,使信仰群体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

引用本文 廖鹏飞, 赵敏. 嵌入与认同: 社会关系视角下滇北基督教的中国化实践 [J].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2026, 8(4): 66–76.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407>.

Cite This Article Pengfei LIAO and Min ZHAO. (2026). Embedding and Identification: The Practi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Northern Yun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8(4): 66–76.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407>

Embedding and Identification: The Practi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Northern Yun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lations

Pengfei LIAO, Min ZHAO*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6531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Systematically advancing the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s in China is a major mission of religious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religious sphere. Existing studies have largely addressed the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s from macro-level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r from doctrinal and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while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the everyday micro-level practices of believers. Based on fieldwork on Christianity in northern Yunnan and drawing on a social-relations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utual adjustment between Christian believers and people outside the church. It shows how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becomes embedded in local social order and produces value identification through behavioral adjustment in kinship relations,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in locality-based relations, and guided adaptation in governance relations. Operating in family, village, and public settings, this mechanism links Christian communities to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ethical orders of corresponding communities. It thus provides a micro-level practical cas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northern Yunnan; social relations;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 黄欣 cpcl@cpcl.hk〕